

经济主体而不再是行政机关的附庸。

在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之间,有几种中间状态。如果将决策权力机构简化成三个等级即中央单位、中间单位(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企业),而以“+”号表示在转移过程中权力有所扩大,“-”号表示权力缩小,那么有如下表所示的五种不同分权结果:

	1	2	3	4	5
中央单位	-	-	-	-	-
中间单位	-		+	+	+
基层单位	+	+	+		-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分权,既有经济性分权的因素,也有行政性分权的因素,大致对应于表中第3种情况。

的确,与改革前传统体制下那种大一统的情况相比,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经济性分权即市场机制的引入,而行政性分权正在起着越来越严重的负作用,成为双重体制并存和胶着的重要原因。

行政性分权的结果,是出现了活跃的中间层,其行为具有非规范化和短期化的特点。

首先,对上同中央讨价还价,对下“管、卡、压”,强化对属于自己管辖的企业的微观干预,其程度与传统体制下中央机关对企业的干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强化了干预造成企业的“双重依赖”

状态:一只眼睛盯着上级官僚,一只眼睛盯着市场。

其次,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免受与外地企业竞争所带来的市场压力,地方政府在各自辖区内采取封锁和分割,妨碍商品和要素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严重破坏市场的统一性和竞争性;对外则互相压价,自相残杀,削弱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换句话说,行政性分权造成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局面。

第三,为了增加纯收入而不是利润,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扩大投资规模,盲目发展短期内盈利高的企业和产业,加剧了重复建设。最典型的例子是冰箱行业,在过去几年中仅是杭州市就一哄而上,建了30多家电冰箱厂。在全国上百家电冰箱厂中,一般年产量都在20万台以下,而万宝集团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年产70万台,没有一家达到国际公认的年产量80~100万台的经济规模。

最后,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使国家的税收、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行政性分权不仅导致了社会经济资源的低效配置,造成大量浪费,而且还产生了其他经济问题。例如,双轨制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毫无疑问,行政性分权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背道而驰的。

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行政性分权也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的穷途末路。只有尽快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彻底摆脱行政干预,成为面向竞争市场的独立主体,我国的改革才能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 冷远猷)

科技动态

全国第一届系统可靠性及概率风险研究学术交流会召开

1993年5月24日至6月2日中国运筹学会可靠性学会于重庆—武汉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系统可靠性及概率风险研究学术交流会。会议由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所主办,重庆大学系统工程及应用数学系和武汉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协办。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市及军队的有关院校、研究所以及工厂,企业的67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出席了会议,论文集收入论文57篇。

会议听取了学会顾问何国伟教授关于从以性能为主转变为以效能为主的新的质量观的报告。他指出效能是可用性、可信性和固有能力(主要和性能有关)的综合,其数学公式为 $E=ADC$ 。这种质量观的转变来之不易,海湾战争的巨大冲击波,终于使我国有关部门特别是军队最高决策层,认识到可靠性的重大意义。他的报告,观点新颖,论证有力,与会代表深受启发。

代表们还观看了由清华大学等单位设计的故障树分析,自动建造故障树、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和系统可靠性预计等七个计算机软件的演示,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和咨询。代表们对计算机演示这种信息交流方式表示赞赏。认为应继续加强推广高质量的成熟计算机软件,以节省大量开发软件的人力和物力。

高级研讨班的重点课题为大型复杂可修系统的可靠性、维修性问题,软件可靠性的理论和应用现状,灾害的风险管理等。清华大学等院校所的代表作了重点发言。代表们特别对重点发言中关于大型复杂可修系统的模型化方法,动员巨大人力物力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的坦克的可靠性、维修性数据的现场统计和处理,以及中国社会风险本底的社会调查资料感到兴趣。

可靠性研究在我国只有十多年的历史,能获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然而比之发达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我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加强学术理论和实际应用部门的合作。这是代表们一致的看法。会议产生了以清华大学梅启智为主任委员的系统可靠性及安全性专业委员会,下一届年会在1996年举行。

(宋钧)